



民粹主义：给欧洲国家带来的风险和影响

斯特凡·莱纳¹

编者按：自2016年以来，一股民粹主义浪潮席卷欧美国家，对现存的国内和国际秩序构成挑战。这一趋势是会继续蔓延还是会逐渐消退，成为世界政治中的热点议题。本期摘译推荐欧盟问题专家斯特凡·莱纳的采访文章。他在文中指出民粹主义对国内政治和国际关系造成的六大风险，并分析了其兴起的原因。他认为，民粹主义政党还不足以直接影响欧盟和欧洲国家的政策，但让主流政党变得更加保守；它们虽然在2017年的几次选举中未能取胜，但支持基础仍然广泛，对现存秩序的威胁不会消失。

一、民粹主义的六大风险

美国政治学家弗朗西斯·福山曾说：“民粹主义是政治精英给受到普通公民支持、但他们自己却不喜欢的政策所贴的标签。”民粹主义不应被视作病症，而是民主的固有元素。当民众的重要关切为精英所忽视时，民粹主义运动就可能对既有体制构成挑战。民众的想法能使民主更具活力，将更多人民纳入政治进程，从而调整政治体系，使之与社会变迁相契合。

但是，很多时候民粹主义运动未必有这些益处。

¹斯特凡·莱纳（Stephan Lehne）现为布鲁塞尔卡内基欧洲中心的访问学者，曾长期在奥地利外交部和欧盟理事会工作。本文英文原文载于卡内基国际和平研究院网站：<http://carnegieeurope.eu/2017/06/06/populism-risks-and-impact-on-european-states-pub-71170>。此为中文摘译版。

首先，民粹主义往往建立在对“我们”（纯粹的人民）与“他们”（腐败的精英及外国人）的粗浅划分上。民粹主义者通常声称自身具有绝对的道德优势并掌握全部真相。他们不承认反对方的合法性。同理，他们还固执地反对妥协，不愿建设性地参与政治过程。

第二，民粹主义的运作方式会导致关于政治问题的理性讨论锐减。政治中总有很多谎言，但我们最近目睹的现象，如特朗普上台及英国脱欧公投，却具有新的特质，一些观察者称之为“后真相”时代。

第三，民粹主义常由魅力型领袖引导，缺少内部民主与问责制。这些领导者往往信奉个人崇拜，他们一旦上台，就会转向专制。腐败与权力滥用的风险由此升高。

第四，民粹主义者往往反对代议制民主，支持各层级的直接民主。这为他们提供了进行社会动员的有利条件。但由于缺乏理性辩论与深入探讨，公民投票时常受无关因素的影响，导向武断的结果。就如同你总会得到一个答案，但实际上是答非所问。

第五，许多民粹主义者坚持国家主权至上。他们本质上不信任国际规则，倾向于采取“零和”外交政策。对所谓民族国家“黄金时代”的怀念，亦使他们对欧盟等国际机制深感怀疑。

第六，对国家主权的痴迷意味着民粹主义政党面对二十一世纪的新挑战，难以提出令人信服的解决路径。许多挑战与问题在本质上具有跨国性质，如气候变化、移民问题、经济发展、科技进步、区域与全球稳定等。如果我们撤回吊桥，退到围墙内，是不可能应对这些挑战的。所有目标的实现均需要开放的思维与国际合作。

二、民粹主义兴起对欧盟的影响

在欧盟机构中，中右派和中左派的主流政党仍占主导地位。约有25%的欧洲议会议员属于民粹党派，但在决策过程中，这些政党中的大部分都会被边缘化。因此，民粹主义兴起所产生的直接影响有限，但间接影响不容忽视。出于对民粹主义的恐惧，主流政客优先考虑国家利益，对欧盟持怀疑态度。这削弱了欧盟成员国之间的团结，并使欧洲问题的解决方案更难以取得进展。民粹主义政党还使得要求对欧盟事务进行全民公决的呼声日益高涨，这对它们来说是最佳的动员手段。

最近在希腊、丹麦、荷兰和英国的公投经验表明，在当前的政治气氛中赢得选票是多么困难。对于未来进一步遭遇失败的恐惧已然削弱了欧盟采取重大改革的信心与能力。

三、民粹主义兴起的原因

有必要区分长期因素与触发因素或者说催化剂。首先，在美国和欧洲对全球化的反对相当广泛。这些人群受困于收入增长停滞、失业与社会不安全感。他们对于不平等现象的增加与日益悬殊的差距到愤怒，而且认为其子女的生活处境会比自己更糟。另一个长期因素是代议制民主的危机。由于多重原因，公众与政治代表之间的纽带已被削弱。许多人丧失了对主流政治程序的信任，转而对其他政治形式寄予希望。

2008年金融危机与2015年、2016年的难民危机是催化剂。它们强化了不安全感与失控感，从而加深了民众内心已然存在的失望与挫败，激发了民粹主义政党的兴起。

另外，如同在美国那样，欧洲的许多民粹主义运动也善于利用社交媒体，这令很多主流政党望尘莫及。社交媒体的时效性、表象性与互动性使其非常适合传播民粹主义思想。信息的碎片化对民粹主义者有利。“后真相”与“伪新闻”的现象给传统代议制民主带来了巨大挑战。迄今，还没有人能够提出令人信服的应对方法。

四、民粹主义会退潮吗？

在经历了脱欧公投与特朗普上台的双重冲击后，一种多米诺骨牌理论发展起来，即认为一个接一个的欧洲民主政体会屈从于民粹主义的诉求。但这一解释是经不起推敲的，因为政治形势以及选举、宪法规则等都因国家而异。

由于荷兰的比例选举制度和潜在结盟伙伴的缺席，基尔特·威尔德斯从未有过领导下一届荷兰政府的现实机会。不过，他意料之外的不佳表现和马克·吕特的成功还是在心理上鼓舞了欧洲主流政党。不幸的是，威尔德斯的排外言论与对欧盟的抨击确实使荷兰的一些主流党派趋向于对移民与欧盟采取限制性的政策。

由于奥地利总统没有实权，这次的选举主要是象征意义上的。尽管如此，绿党候选人亚历山大·范德贝伦击败了右翼的诺伯特·霍费尔，这证实了亲欧式自由主义仍是可以赢得选举的。不过，霍费尔及其自由党在奥地利仍得到广泛支持，他们可能在2018年10月的议会选举中做得更好。

民粹主义政党现在已经进入几个欧盟成员国的政府，作为联合政府中的较小执政伙伴。这些政党的经验不尽相同。有时，加入联合政府会促使一个民粹主义政党向主流靠拢，并更加负责，比如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的绿党。有时，随着选民注意力的转移，这些政党会丧失原有的支持，比如芬兰的正统芬兰人党。当然，在民粹政党管理

政府时，情况就不同了。我们会看到民族主义兴起，宪法制衡与媒体自由遭到削弱，这些无不引起人们的担忧。

欧洲国家 2017 年的大选显然是非常重要的。但是，相信民粹主义浪潮会倾覆现存的欧洲政治秩序，是错误的。反过来，因为威尔德斯的败选、马克龙对勒庞的胜利以及德国选择党的失败而认为民粹主义威胁将会消失，同样是错误的。只要西方社会大部分地区发生异化与疏离的主要原因没有得到解决，全球化中的失落者与传统民主政治的失败等问题没有得到解决，挑战就仍然存在。

五、如何应对民粹主义的冲击

欧盟及其成员国必须更加注重社会不平等与不公正的后果，采取行动缓解全球竞争和不平等对弱势公民的影响。除了为这些人提供机会与帮助外，欧盟还需要通过推行更公平的税收制度来解决不平等现象，确保跨国公司支付公平的份额，暴露避税港，防止洗钱和腐败。

移民管理是另一项挑战。考虑到人口下降，欧洲需要一定的移民，但这个过程需要有序谨慎地处理。这需要对外部边界进行更好的控制，在移民与庇护区域内建立更好的规则以及更加有效的机构与制度。

解决公民直接关心的问题当然是重建信任与打败民粹主义的最佳途径。但欧盟机构与成员国政府也应该探索使政治更透明、更具有参与性和民主性的新途径。如果公民更具参与感，他们就会对政治代表更加信任，也就不易被民粹主义政党简单化的解决方案所吸引。

（刘王雨竹摘译，归泳涛校）